

融入欧洲

二战后德国社会的转向

序

凡被人为分裂的国家或民族，在一定的国际形势和内部条件下，总是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完成统一的。这是因为历史和亲情是无法轻易割断的。被分裂的人民，渴望统一，血浓于水。

然而上世纪末，德国的统一过程，不论事前或事后，都曾引起各国政要和学者的普遍疑虑和担忧。人们问道：统一后的德国，是否将重新称霸欧洲，使之成为“德国的欧洲”呢？还是将成为“欧洲的德国”，即融入欧洲一体化，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成为欧洲平等的一员？

人们的普遍担忧是有理由的。因为二十世纪前半叶，德国曾经两次挑起世界大战，企图称霸世界。当时咄咄逼人，不可一世的气势，令人至今心有余悸。同时，德国始终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战后，四国占领期间，德国军事力量虽然大大削弱，而东西分治后的联邦德国的经济实力反而逐渐增强。在东西德统一前，联邦德国的经济实力，在欧洲共同体中已执牛耳。而统一后，德国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 1/5 强，是欧洲共同体中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德国人口在文化素质和科技潜力方面，是高质量的人口。再加上德国强烈的民族主义表现，统一后发生在全国各地变本加厉的排外事件……，凡此种种，莫不使人忧心忡忡。

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对今后统一德国的走向，自然也言人人殊，莫衷一是。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融入欧洲——二战后德国社会的转向》，是作者辛蕾博士在联邦德国用十余年时间，研究几乎

全部德国演变的历史资料,并从各种角度实地考察德国政治文化和社会意识的变迁,从而得出“德国社会在转向”,而其发展前景是“融入欧洲”,一如书名所提示的这一比较乐观的结论。据我所知,它也是大多数德国学者的看法。

本书作者通过分析特定时间段内的社会趋势,政治取向,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以及政治人物立场之间的互动作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从分裂到统一的原因及内在因素进行了详尽剖析。她从历史上德国国家形势的变化,分析当时引起各种变化的社会趋向。她沿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和没落,以及政治社会趋向民主化的脉络,为我们描述了联邦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在两德统一后逐步融入欧洲国际社会的合乎逻辑的图景。她认为,二战后,深受纳粹德国恶名之累的德国人民逐步放弃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坚持实践和追求政治社会民主。她特别着重分析导致政治变化的特定人文、政治经济与社会条件,以及政治变化对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的反作用。作者也分析了德国统一前后出现排外倾向的原因,说明了德国东部和西部人民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双方为统一、共处所做的颇有成效的努力。关于德国历史上存在的极端民族主义,作者也全面地论述了其形成的因素和历史过程,并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今日德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已不再建立在“优越民族论”的神话上,而是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联。作者通过其对今日德国政治社会的详尽考察和严谨的逻辑分析,从而得出了她的结论:统一后的德国,通过全社会的认真反思,敢于直接面对纳粹历史,从而坚持走民主道路。德国正在融入欧洲,并行将成为一支稳定欧洲的政治经济力量。

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对德国的历史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发表论著。但是从历史和政治文化的角度对二战后德国政治

社会和民族意识的变迁进行系统研究和分析的著作，还不多见。我认为本书的出版，是在德国问题研究领域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当然，学者不是预言家，不能未卜先知。政治学者只能根据材料的占有和系统科学的分析，对现实政治的发展做出各自的合乎逻辑的结论。然而实际政治错综复杂，它不能摆脱各种国际国内诸种变化着的和突发性的因素的制约。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没有预见到当前这一浪高一浪的科技革命，竟是烂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带头。

即如民主制度一事，我们看到自命为，同时也是一般公认的“民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已经堕落到用先进武器到世界各地去推行“民主制度”了。“先发制人”、“单边主义”战略的悍然提出，说明事物快要走到它的反面了。发展下去，谁能保证由魏玛共和国的民主走向第三帝国的法西斯那种故事不能重演？

当然，我也不是说科学研究不能预见未来。问题是应该提倡不同意见的争论。前提是什么不同观点的提出，都必须有足够的翔实资料（论据）来支持，要做到观点和材料的统一。

真理，只能从各种不同意见的理性争辩中，从不断更新自己的观点中逐步接近。

赵宝煦

2004年5月10日

鸣 谢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来自中德多方面的支持和协助。北京大学的赵宝煦教授一直十分关注我的工作。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学院则为我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了便利条件。与德国的教授金德曼博士、瓦格纳博士、格勒博士、方伟纳博士等人交换意见使我深受启发。对写作本书十分有益的还有我对数位时代见证人进行的访谈。联邦新闻局的沃尔法特女士、联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艾德曼博士协助我完成本书的写作准备。联邦议会和联邦政府新闻局为本书提供了图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陈军先生给予我以充分的理解并提出了诸多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对我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学院暨欧亚研究中心。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真诚感谢上述机构和个人。同时,我对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编辑、设计与宣传人员表示谢意,感谢他们为本书的出版所作的努力。

我还要特别感谢家人常年的理解与支持。

辛蕾

北京

2004年10月30日

目 录

1 序/赵宝煦

1 鸣谢

1 导言

16 第1章 战争与失国

——民族主义的实践与教训(1871—1949)

27 第1节 战争噩梦与和平幻想

——从德意志帝国到魏玛共和国

47 第2节 饮鸩止渴

——关于希特勒的上台

64 第3节 自食其果

——谈德国分裂的根本原因

83 第2章 建设、整合与立国

——民主的努力与收获(1949—1990)

95 第1节 为历史负责

——关于联邦德国的政治秩序与社会运动

158 第2节 创造历史的期望

——民主德国的国家与社会

173 第3节 水到渠成

——论德国的和平统一

232 第3章 一个正常的欧洲民族国家(1990—)

258 结束语 融入欧洲

268 大事记

288 图表索引

291 参考文献摘要

315 人名译名表

导 言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纳粹德国战败投降。4年后,冷战开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随之被分别建立。德国分裂。当时,没有人想到,这分裂的德国41年后能够和平地统一。1963年夏天,民主德国修建柏林墙。这使得分裂问题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得不到解决。1970年12月7日,正在波兰访问的、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面对华沙犹太人居住区英雄纪念碑^①下跪——那幅画面至今震撼人心——以表明德国人忏悔过去的决心,展现联邦德国政府奉行与东欧各国和解政策的诚意。这之后,两德政府于1972年12月签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关系的基础条约》(简称:《基础条约》),承认两德并立的现状。在此后的20年间,两德人民之间休戚与共的情感愈见浓厚。这情感在1989年冬爆发。民主德国人提出统一的要求。民意推着两德政府走上了统一德国之路。随着冷战的结束,在国际社会的瞩目下,两德的政治统一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实现:民主德国于1990年10月3日正式走入历史,联邦德国的领土向东直扩大到奥德河畔。

① “犹太人居住区”最初指16世纪初在威尼斯的犹太人聚居地,后泛指由当局强迫划定的犹太人居住地。这种居住地体现种族歧视。在16世纪,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和东欧的一些地方出现过“犹太人居住区”。18和19世纪期间,随着公民权和犹太人解放意识的出现,“犹太人居住区”逐渐消失。此后,“犹太人居住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再次出现。纳粹德国在占领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强迫犹太人居住在特定地区。犹太人再从这里被运到集中营,最后被杀害。

统一后的十几年间,德国东西部社会的隔阂凸显,德国的失业率因经济不景气而居高不下。但德国的社会没有因此而弥漫民族主义的情绪,



插图1 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纪念碑前下跪(1970)

完全不同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情形。今天的德国人坚持民主的社会生活,认同欧洲。对纳粹德国历史的系统反思和批判引人注意。虽然极右政党在东部的影响扩大,但民主政党维护现行民主政

治体制的决心不变。它们遏制极右势力的发展,也直面移民问题,推动移民融入德国人社会。同时,联邦政府积极推动欧盟东扩和立宪。与曾经令欧洲动荡的希特勒德国相反,今日德国是稳定欧洲的一支力量。可以说,在二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德国社会在转向,在融入欧洲。这转向从何而来?今天的德国又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这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

回答上述两个问题需要从讨论德国的政治文化入手,即需要探讨德国公民对德国政治秩序的观点,也需要分析他们对这政治体制效能的看法,了解他们所处政治体制的内涵及其运转方式。后者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体现德国人所重视的价值,还在于,它多少反映他们典型的政治行为方式。了解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有助于理解他们的主观政治态度。一个社会的政治取向就取决于其成员的政治态度。

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本身指一个公民社会的成员总体对其所在政治体制及其运转原理的基本态度、信仰和行为方式。政治文化不同于传统意

义上的文化。后者针对思想、宗教以及美学。^①政治文化包括态度和行为两部分,概括一个政治体制的成员所拥有的思想与行动氛围。其表象主要为社会个体或群体对诸种政治现象的主观认识与期望^②。通过政治文化,人们可以了解政治在一个社会中的意义和作用^③,可以分析政治人物的行事风格,因此可以对这个社会的精神光谱有一个总的理解。认识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可以从了解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形式、政治精英的形成基础以及解决社会冲突的可能政治途径入手。^④理解这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则需要研究相关政治思想。政治思想是构成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的基本因素。

研究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需要考察这个社会的历史、现状及其成因。一个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对其成员的主观态度和情感基调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不过,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日常政治生活充满变化。为回应时局的变化,社会个体或群体有时会做出难以用逻辑来解释的政治行为。要解释这种貌似不合逻辑的行为,就要观察他们的政治行为、政治语言、政治象征符号和有关数据,再理清几者之间的相互关联,然后根据他们所在政治体制的思想基础,找出他们的政治行为特征。要确定的是,基本思想是否内化在了社会成员的行为中,或如何通过社会成员的行为得到体现。因此,研究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需要关注相关的民意调查结果。

回答前述涉及二战后德国社会转向的两个问题,我将分析两德国民的政治态度。具体来说就是,一、联邦德国人认同民主政治的特点;二、民主德国人追求民主政治的过程和原因。鉴于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并存乃战后德国分裂的形式,分析这两个国家国民的政治态度,就意味着探讨他们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因此,我将探讨战后德国人如何对待在德国

① 参见:韦伯(M. Weber),《关于宗教社会学的文集 I》,图宾根 1988 年,第 252 页。

② 参见:阿尔蒙特、维巴(G. A. Almond, S. Verba)主编,《公民文化再探——一份分析性研究》,波士顿 1980 年,第 26 页。

③ 参见:艾尔金斯、西蒙(D. J. Elkins, R. E. B. Simon),《效果研究专题,或政治文化解释什么?》载于《比较政治》,第 11 期,1979 年,第 127~145 页。

④ 参见:鲁茨欧(Wolfgang Rudzio),《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治体制》,第 3 版,奥普拉登 1991 年,第 445 页。

历史中存在已久的民族意识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今日德国人之认同欧洲和坚持民主政治乃是他们不再认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代表的价值。阐释这价值转向是本书的中心内容。

本书以德国的历史脉络为经线、以历史转折关头的社会趋向为纬线展开。通过对德国国民或选民在 20 世纪的世界及欧洲局势动荡时期的政治选择及其后果的分析,我将解释:a) 德意志民族国家自其建立就有的困境;b) 德国人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追求和因此所必须吞咽的苦果;c) 德国社会由来已久的多元状态和内在紧张关系,以及德国人为整合社会所作的努力及其成果。我将阐释战后德国人抛弃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因、接受民主政治的动力以及实践民主的形式。为此,我将分析德国在 20 世纪前半叶一再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为取向而与其他欧洲强国争霸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重新认识民族意识并接受民主政治的过程或原因;冷战后,他们坚持自由和民主,坚持认同欧洲而拒绝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

为方便读者理解和把握将要讨论的具体问题,我先对德国自 19 世纪起的曲折道路及其背景进行扼要介绍,再解释书中将涉及的关键概念。

在欧洲的工业化过程中,德国不是第一个,也非最后一个工业化国家。当它在 19 世纪中期进行工业化时,英国和法国已经是工业化国家了,但也还有些欧洲国家尚没有开始工业化进程。欧洲的第一波工业化浪潮出现在 18 世纪,第二波工业化浪潮发生于 19 世纪的最后几年。德国的工业化就介乎于这两波浪潮之间。第二波工业化浪潮在欧洲范围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在这次浪潮中,一个多面向的经济生产体系出现。德国处在这个体系的枢纽位置。那是个民族竞争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德国作为后起的工业国家没能成为欧洲经济体系的枢纽。它显得雄心勃勃,一方面与老牌工业化国家竞争,另一方面与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发展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 30 年间,德国社会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一样逐渐被淹没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中。这浪潮最终将德国推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

所谓“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指民族意识政治化的结果。概括地说,民族主义就是以民族这概念凝聚具有同一语言的国民,以共同行动。它最

初与自由和民主的思想紧密相连。民族主义者追求政治上的自由。因此,到19世纪末期,自由主义者也接受民族主义。例如,对意大利和德国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民族统一始终与政治自由相辅相成。但到20世纪初,民族主义取代自由主义成了主导欧洲的思想潮流。追求国家强权地位被看作民族的任务。这点在保守派政治家主政的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俄罗斯表现得尤为明显。出现这变化,是因为,当时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寻求用民族意识来凝聚人心,以解决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即缓解日益明显的社会分化。但结果是,欧洲各国相互争斗,欧洲的社会结构被动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间,欧洲列强相互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展开了殊死搏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导致各国帝国主义化。它们在世界上尚未开发的地方以暴力追逐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出现这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的自由主义者认同帝国主义。英国的自由主义者是这样。^①德国的自由主义者则不反对扩张,并主张以强大的军事力量贯彻德国追求世界强权的政策。他们的根据是历史学家特赖奇克关于民族国家的学说。特赖奇克将国家的本质定义为民族的权力组织,认为,只有军事化大国才符合理想。1897年,他明确指出了德国追求世界强权地位的意义:

“在欧洲强权瓜分欧洲以外地区之事上,德国迄今总是吃亏。这关系到我们作为大国存在的问题,即我们是否也能成为非海洋强权。否则,俄罗斯和英国瓜分世界的前景就是可怕的;人们真的不知道,俄罗斯的皮鞭和英国的钱袋哪个更加不道德、更加可怕。”^②

不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有直接影响的却不是帝国主义理想本身,而是主张追求国家权力的新保守主义思想。由于帝国主义扩张权力的理想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向往归根到底不能相互调和,因此,随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化,自由主义阵营分裂,崇尚服从和为国献身的

① 参见:迪克斯(Charles Dilkes),《大不列颠》,1868年。西莱(John Robert Seeley),《英国的扩张》,1882年。

② 转引自:沃尔夫冈·J·莫姆森(Wolfgang J. Mommsen),《帝国主义时代》,费舍尔世界史,第28卷,法兰克福(美茵河畔)1969年,第21页。

新保守主义思想兴起。这种思想否定自由,以神话化的民族概念为核心,包含反犹和种族主义的元素。根据这种思想,民族权力是首要坚持的价值。^①这保守的思想在当时吸引了不少那些担心过多民主会引发暴民统治的市民。市民倾向以强化国家权力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这种倾向没有受到来自左派阵营的反对。当时的左派还构不成强有力的政治力量。^②而对国家权力的追逐最终引发外交危机。外交危机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在追逐国家权力这点上,德国跟上了欧洲的潮流。自19世纪90年代起,为对内显示权威,德意志帝国的主政者“以世界政治为己任,(以行使于)世界的权力为目标,(以)舰队为工具。”^③他们推行扩张殖民地的政策,挑战英法这两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以期激发国民的国家认同。这是因为,当时德国人的民族意识取决于德国国家的地位,或者说,国家的权威。到1914年,他们的这个政策效果显著:德国人的国家认同感确实呈上升趋势。当德国政府宣布参战后,不少国民带着为国捐躯的民族主义热情走上了战场。

然而,帝国没有因此免于被抛弃的命运。随着德军在军事上陷入困境,德国内部的食品供应趋于紧张。在城市地区,定量供应的食品甚至还包括马肉。德国的资源短缺问题凸显,国民面临生活问题。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大部分德国人不再相信世界政治,转而关心自己国家内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威尔逊于1918年1月发表的14点和平声明成了他们的希望所在。他们认为,德皇要为灾难负责。他们希望与邻国和睦相处。于是,他们转向民主,支持在德国实行议会民主政治。他们

① 例如,作家查尔斯·莫拉斯(1868—1925)在1899年创办月刊《法兰西行动》,传播专制等级国家思想。

② 这主要因为工人运动的整体力量弱。在欧洲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人运动在19世纪中蓬勃展开。工人与市民进行公开的斗争。但不同国家的政治传统和社会关系决定了,各国的工人运动各有不同的特点。此外,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企业联合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等各种意识形态也都能在工人运动中找到支持者。而不同意识形态的信仰者之间则争斗不休。工人运动整体因此难以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③ 参见:《德国历史问题——1800年以来的思想、力量、决定》,联邦德国议会公关部主编,波恩1994年,第251页。

以为,德国一旦实行民主政治,便有希望得到和平。这种希望引发了1918年的革命。革命爆发后不久,德皇退位。次年,魏玛共和国诞生。

魏玛共和国并没有使德国人得到和平。共和国建立之初,战争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德国。帝国制度向共和政体的转型在新旧势力的冲突中进行。共和国政府必须与旧有的统治阶层争夺利益,这使政府的行动能力受到限制。而《凡尔赛和约》的规定也使德国人整体感到压抑。根据这 and 约,德国失去土地和人口,在军备发展方面受到限制,并且处于沉重的赔款压力之下。如果说失地和限制军备打击了德国的雄心,那么赔款则使德国不堪重负。在支付赔款一事上,共和国政府除了通过大力加强税收体系来筹款外,别无其他手段。但问题是,政府同时无力抑制通货膨胀^①,反而愈来愈依靠贷款应付开支。这导致德国的物价飞涨,国民为保值而储存实物。德国政府逐渐丧失支付能力。这使大部分国民认为,民主政治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属于中产阶层的市民对民主尤其失望。这种状况没有因为共和国的外交成就而有改变——1925年,德国通过《洛迦诺公约》已经有望在欧洲获得政治地位。^②在民主政治失效、德国在国际

① 这点在1931年世界经济危机中尤其突出。经济大衰退始于美国。其时,除经济封闭的苏联外,其影响波及世界各地。结果,世界贸易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使重建自由世界经济的希望消失。但德国一再被要求支付战争赔款。时任德国总理的布吕宁(Bruening)采取以平衡国家财政为目的的通货紧缩政策,寻求利用经济危机造成的形势使德国摆脱支付战争赔款的压力。他设法同协约国谈判取消赔款。但他同时没有通过提高国家支出来支持经济的运转。这使德国内部的工资、利息等急速下降——1931年12月8日,所有的收入被降至1927年1月10日的水平,同时,工商业、金融业和服务业萎缩。结果,在1931至1932年间,失业率升至40%以上。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因此陷入危机。当时的一位观察家认为,布吕宁“自杀式的政策源于其普遍意义上的哲学思维。他惧怕快速通货膨胀的幻想,不懂得通过创造工作位子来避免使失业者绝望。”引言摘自:盖耳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20世纪经济史——见证报告》,汉堡1995年,第102页。

② 《洛迦诺公约》包括1925年10月5、6日由比利时、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达成的一揽子协议。协议于同年10月16日在洛迦诺草签,于同年12月1日在伦敦签署。签约国共同保证德国与法国和比利时的边界、莱茵地区非军事化、禁止入侵行动以及和平解决争端。英国和意大利对此安排提供保证,将制止毁约行为。但德国外长施特雷泽曼(Stresemann)拒绝接受与波兰的边界划分,其他签约国也不愿提供保证。但德国与比利时、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仲裁协议,保证和平解决争端。同年的10月26日,法国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援助条约。最后,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德国得到各民主国家的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紧张局势由此暂时得到缓和。

社会的处境不见有根本好转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思潮在德国社会很快占了上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国社党;贬称:纳粹党)顺应并驾驭了这股潮流,获得愈来愈多的市民的支持,并最终在1932年成为德国议会中最大的政党。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此后不久,魏玛共和国被第三帝国取而代之。



插图2 华沙犹太人被驱赶

纳粹上台后不久,德国的大批文学家、艺术家以及部分民主政治活动家踏上了流亡之路。1945年,第三帝国随着德军对盟军的无条件投降而消失。它共存在了12年。在这12年间,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被发展到

极致,国家权力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第三帝国的国民生活在纳粹专政的恶梦中。在世界上,德国成了侵略的代名词。1939年,希特勒以扩大德意志民族生存空间为名进攻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纳粹德国的军队横扫欧洲大陆,进攻苏联,挑战美国。众欧洲国家的人民丧失家园。同时,希特勒政府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犹太人在欧洲范围内受到迫害。一时之间,德国大有称霸世界之势。但最终,纳粹德国受到美、苏、英、法盟军的围攻。德国这块土地陷于战火。1945年,希特勒德国的军队向盟军投降。德国的主权随之归这四个战胜国共有。

随着德国丧失主权,中欧出现权力真空。不久,苏联与美国、英国、法国在解决德国问题上发生分歧。美苏这两个在二战中崛起的超级大国在

欧洲地区争夺权力。美国于1947年6月提出欧洲经济重建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并在一年之后与西方盟国在伦敦就在德国西部组建国家一事达成协议。为阻止这协议的实施,斯大林主政下的苏联封锁柏林与德国西部的陆路联系,并期望与西方盟国再次就解决全德问题进行对话。但苏联的封锁政策并不成功。苏联因其封锁行动而使自己显得具有侵略性,反而使西方盟国加强团结。美国通过空投食品及日用品等使柏林西区市民的供应得到保证;法国则担忧德国再次崛起,因此更愿看到在德国西部成立一个政府,而非全德问题的解决;西柏林市民感激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和援助。西方三个盟国进而结成了针对苏联的联盟。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在西方联盟的框架中,联邦德国成立。1949年5月8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简称:《基本法》),即宪法,在德国西部的议会参议会获得通过,5月23日公布。同年8月14日,第一届联邦议会选举举行。1955年,联邦德国加入北约。苏联采取与西方盟国针锋相对的举动。1949年5月,苏联结束对柏林的封锁;同年10月7日,民主德国成立。1955年6月,华沙条约组织成立,民主德国成为华沙条约组织的一员。两个德国建立并分属东西两大对立阵营。这格局使美国和苏联在欧洲的权力范围泾渭分明。欧洲分裂。

从两个德国的成立过程不难看出,德国的分裂是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较量的直接后果,而非德国人民自由的选择。因此,两个德国的取向和发展就与冷战中的国际政经局势息息相关。作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一员,联邦德国实行议会民主制和市场经济;作为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成员,民主德国则走现实社会主义和指令经济之路。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德国都没有寻求以德意志民族或德意志民族利益来解释其走向。只是,联邦德国的《基本法》以德国的统一为终极目标,而民主德国则认同德意志文化,但不追求统一。两德政府在1972年12月签署《基础条约》,明文承认德国分裂的事实。它们由此建立了一种联系。^①通过这联系,两德的民间和文化交流不断。这交流使两德国民休戚与共的情感得到保持。在冷战结束来临之际,这种情感成了两德政治统

^① 参见:本德尔(Peter Bender),《新东方政策——从垒墙到莫斯科条约》,慕尼黑1989年。

一的催化剂。

在两德关系存在的 17 年间,对德国人来说,认同国家,就会为民族意识所困扰。反之亦然。因为,对他们来说,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并非一体两面。这不同于法国或英国的情况。在那里,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正是一体两面。联邦德国要整合到欧洲家庭中去,就要排除这困扰。为此,联邦德国的学者以“后现代”等名词概括德国西部的社会政治变化,并且强调,对联邦德国国民来说,重要的是忠于宪法。^①联邦德国政府则在稳定其与民主德国政府之间联系的同时发展并加强与法国的关系,并且加大与法国共同推进欧洲整合的力度。联邦德国人意识到要认同欧洲;逐渐地,欧洲意识成了联邦德国人淡化民族意识的概念。民主德国也需要对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有所解释,以证明自己是东欧集团的坚定成员。为此,民主德国的学者在不否认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同时强调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属性,以强化民主德国人的国家认同。民主德国领导层更坚持对国民进行反法西斯教育。结果,民主德国人从文化认同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比联邦德国人看起来更有民族意识。这点在 1989 年冬到 1990 年秋的德国统一过程中尤其明显。

分裂使两个德国的国民拥有了不同的国家认同,但在抛弃纳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点上,他们没有分歧。战后成长的一代人在这点上明显有一致的认识。经历过希特勒德国的联邦德国人从灾难中认识到纳粹民族主义的局限,在实践中认识并最终认同民主政治。如果说,经历过战争的那代人因为经济奇迹而接受了民主政治,战后成长的一代人则尝试将民主的政治生活社会化。联邦德国的社会生活因而以民主化为特征。民主德国人则在经历了指令经济的失败后没有转向寻找特殊道路,而是将联邦德国视为心中的家园,进而以此为追求的目标。这样,德国的和平统一实际上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为前提。

直到冷战结束,两个德国的政府并没有将解决德国分裂问题作为它们的首要工作目标。它们以和平为先,欧洲的和平被一再强调。这似乎预示着德国分裂的永久化。然而,随着冷战结束,结束欧洲分裂的时机来

^① 与之相关的概念和讨论参见第 2 章第 3 节的相关内容。

临。在这历史转变的关头,民主德国国民要求统一,两德政府作出了相应的反应。在 329 天内,它们完成了关于统一的谈判,并同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四个战胜国谈判收回了主权。^①1990 年 10 月 3 日,联邦德国成为东西部德国人共同的国家。德国的政治统一和平地实现。

统一使联邦德国体制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德国东部,即它不再仅局限于德国西部。这符合大部分前民主德国人的选择。随统一而来的是德国东部的政治和经济转型。所谓转型即意味着将被证明为有效的联邦德国民主政体移植到前民主德国所辖范围内。转型虽然为东部社会带来阵痛,但没有使联邦共和国已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受到动摇。前民主德国没有留下足以影响联邦德国的政治和文化思想遗产。统一后,德国明确强调自己属于欧洲。虽然在统一完成后的最初几年间,德国的极右政治势力有明显扩大的趋势,但总体上看,德国的社会较少为极右思潮所影响,而更多地笼罩在反思、批判希特勒德国那段历史的气氛中。就推进欧洲整合来说,统一后的德国与统一前的联邦德国没有什么不同。

那么,什么是欧洲认同?这个问题难以回答。从某种意义上,“欧洲”现在与欧洲共同体或欧盟同义。它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欧洲整合。而欧洲整合的实现以民族国家主权的弱化为前提,不建立在对语言和民族认同的基础之上,更不像民族国家那样以民族神话为基础。从思想层面说,欧洲认同的基础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因为欧洲的思想和文化是多面的。这种多面性建立在多元历史的基础之上。但由于欧洲整合基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人对建立欧洲和平的共识,因此,欧洲认同建立在对历史的共同认识和对未来的共同希望之上。如果说,欧洲人在克服欧洲分裂的问题上建立了共识,那么,在对未来的共同希望上还有待明确。这是因为,在现实中,欧洲民族国家仍有其不可取代的功能,并且,民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可能消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欧洲各国不再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左右,但欧洲的秩序以民族国家为基础。民族

^① 参见:特尔契克(Horst Teltschik),《329 天——内观统一》,柏林 1991 年。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条约——我是如何就德国统一进行谈判的》,由科赫和维尔特(Dirk Koch, Klaus Wirtgen)主编并作序,斯图加特 1991 年。